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学早期形成阶段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际关系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理解的历史考察

李 涛

摘要: 20世纪前40年是早期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发展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异常丰富的时代。通过对四位杰出国际关系思想家对帝国主义这一早期国际关系重要研究主题见解的考察,发现他们都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集中、工具主义、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等信条作为其政治思想或国际理论的关键要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力量,对早期国际关系的形成发展,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 思想家; 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22) 04—0056—12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叙事,自由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国际主义是国际关系学早期形成阶段的主要思想流派^①,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源可追溯到1919年,且深受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亨利·布雷斯福德(Henry Brailsford)、大卫·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和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等一代所谓的自由理想主义者的启发与影响。^②

虽然这些传统历史叙事在现行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仍然普遍存在,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这些传统叙事背后的一些假设和主张越来越受到诸如大卫·朗(David Long)、布赖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卢西安·阿什沃思(Lucian Ashworth)和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等修正主义学者们的质疑与挑战,这种转变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的“史学转向”。^③尽管传统学派与修正主义学派对早期国际关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国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重大叙事研究(项目号:21ASS00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专项课题项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项目号:21YDYB02)和“云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 涛,男,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

①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2001, p.6, p.8, pp. 29-32.

② S. Burchill & A. Linklater, Introduction, in S.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6-8.

③ B. Schmidt & N. Guilhot(Eds.), *Histor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ix.

系学科的历史叙事存在争论,但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世界大战的惨烈和避免另一场重大国际战争对抗的强烈愿望促成了早期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20世纪的前40年是早期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发展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异常丰富的时代:弗拉基米尔·列宁、卡尔·考茨基、尼古拉·布哈林和罗莎·卢森堡等在以新的形式不断传承、丰富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早期国际关系思想家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国际关系学的形成发展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早期国际关系的互动与影响又是聚焦于哪些主题?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修正主义学者一直在强调帝国主义对20世纪初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如克罗尼斯·波利赫罗纽(Chronis Polychroniou)在其1991年的《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分析》(*Marxist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一书中,将帝国主义描述为“20世纪的标志”。^①威廉·奥尔森(William Olson)和A. J. R. 格鲁姆(A. J. R. Groom)在其《当时和现在的国际关系:解释的起源和趋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n and Now:Origins and trends of interpretation*)一书中也表明“国际关系学科的真正开端是对帝国主义的研究。”^②2005年大卫·朗和布赖恩·施密特等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中也明确提出,早期国际关系的两个主要研究主题就是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③因此,帝国主义既是当时最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希尔费丁、布哈林、列宁和卢森堡等思想家的主要研究途径,也是早期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的重要研究主题。

为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国际关系形成阶段的影响,本文特意选定当时杰出的四位国际关系思想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亨利·布雷斯福德、伦纳德·伍尔夫、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作为研究案例,考察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国际关系学的重大作用与影响,探究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史。本文所选思想家遵循以下四条原则:一是被称为自由理想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二是在当时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知名机构中从事研究;三是撰写了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四是参与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学术辩论。上述四位思想家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在某一时期也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或标记为乌托邦的杰出国际关系思想家^④;他们都参加了当时知名的国际关系相关机构,譬如他们都是英国工党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ACIQ)成员,该委员会是早期国际关系的主要“准学术”论坛之一^⑤;此外,为了谴责大国进行的秘密外交,他们也都加入了民主控制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UDC)^⑥;而且也发表了大量广泛涉及帝国主义主题的论著,也均参与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学术辩论。

据英国“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其基本信条和核心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工具主义国家观、阶级斗争、资本

① C. Polychroniou,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raeger, 1991, p.1.

② W. C. Olson & A. J. 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n and now:Origins and trends of interpretation*, Harper Collins, 1991,p.47.

③ D. Long & B. Schmidt(Eds.),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1.

④ L. M. Ashworth, *Creat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gell, Mitrany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Ashgate,1999, p.129; P. Wilson, "Introduction: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d the category of 'id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 Long & P. Wilson (Eds.),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20.

⑤ L. M. Ashwor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Labour Party: Intellectuals and policy making from 1918-1945*, 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 p. ix, pp.33-34; C. Sylvest,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48,2004, p.413.

⑥ H. Hanak,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istorical Research*, Vol.36,No.94, 1963, p.168; C. Navari, 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 in D. Long & P. Wilson (Eds.),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15.

主义剥削、社会主义和革命。^①因此,本文通过20世纪前40年早期国际关系思想家主要研究主题——帝国主义的棱镜来揭示国际关系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国际关系形成阶段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早期国际关系思想家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集中理论观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上是讨论人类在整个历史上如何与自然界互动。正如1892年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唯物史观是他和马克思所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寻求所有重要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巨大推动力的历史进程观”,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早期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 唯物史观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本文所考察的四位国际关系思想家都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霍布森将其应用于国际层面,认为帝国主义的关键驱动力不是文化、思想或政治,而是经济。^②因此,他认为“除非将斧头砍向树的经济根源,否则攻击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政策将是徒劳的”^③。同样,布雷斯福德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国际事务,认为“经济扩张的强大压力是国际斗争的动力”^④。此外,拉斯基和伍尔夫也将经济学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特权。例如,拉斯基称“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婢女”^⑤,而伍尔夫则强调“在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每一步,经济驱动都很明显”^⑥。这番话让人想起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最著名的格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⑦。

也许有人会质疑,赋予经济学以特权本身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早期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影响。然而,除了霍布森外,本文所考察的其他思想家都承认他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拉斯基曾强调经济对其他因素(如政治)的重要性,但当时他还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⑧然而到了1928年,他则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学说,既简单又真实。它的论点是,在任何时候,一个社会的主要变化机制是所获得的生产系统”^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拉斯基一直公开表示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当他研究帝国主义时。1933年,在一篇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章《和平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中,他肯定地说:“没有人否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是为了保证英国债券持有人的投资;南非战争只是一场争夺其金矿统治权的肮脏斗争。”^⑩

伍尔夫也承认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他对国际事件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在其1939年的著作《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中,他提出英国在二战初期的绥靖政策是帝国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关于瓜分世界的协议。他认为,这“只有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进行正确解释”^⑪。

尽管霍布森没有明确地认为他的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他在晚年时承认,他确实曾“主张经济

① H. J. Laski, *Marxism after fifty years*, *Harold Current History*, No.37, March 1,1933,pp.691-692;H. J. Laski,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ocial Scientist*, Vol.27,No.1, 1948,p.52, pp.70-71,p.83, p.87, p.93.

② J. A.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James Pott & Company,1902, pp.v-ix.

③ J. A.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 1938, p.93.

④ H. N. Brailsford, *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peace*, G Bell & Sons, Ltd, 1918, p.42.

⑤ M. DeWolfe (Ed.),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Ho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s. 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76.

⑥ L. Wool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Swarthmore Press Ltd,1920a, p.26.

⑦ K. Marx &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848, p.36.

⑧ M. De Wolfe (Ed.),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s.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76.

⑨ H. J. Laski, The value and defects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Current History*, Vol.29,No.1, 1928, p.23.

⑩ H. J. Laski, The value and defects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p.507.

⑪ L. Woolf, *Barbarians at the gate*, Victor Gollancz Ltd, 1939, p.208.

决定历史”。^①与之相反，布雷斯福德承认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立场。1947年，在纪念霍布森的演讲中，布雷斯福德善意地批评他的朋友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经济为基础的方法论中的重要性，而霍布森和布雷斯福德本人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帝国间的竞争。由此可见，虽然霍布森没有公开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的国际理论中的影响和烙印，但其他人，如布雷斯福德，却认为霍布森的国际思想中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

（二）资本集中理论观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某些地方（如德国、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时代，在他的最后一部论著《资本论》中，他预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将出现“资本集中”的趋势，这意味着两件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一是由于生产过剩，资本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积累会越来越多；二是资本主义将放弃其传统的竞争性做法，进入一个更加倾向于保护主义的时代，垄断将变得至关重要。^②早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也将这些思想应用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中。

尽管霍布森没有公开承认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他在20世纪末阅读了《资本论》^③，而且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叙事的影响。继马克思之后，霍布森在1902年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中声称，“19世纪末见证了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做法的显著转变”^④。此外，他还强调，由于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末产生了大量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是由少数人积累的，他称之为“工业巨头”或“工业大亨”。^⑤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工资很低，不可能在国内消费所有生产的产品。因此，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储蓄并寻求将他们的剩余资本投资到海外。

对霍布森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美国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盖洛德·威尔希尔（Henry Gaylord Wilshire）。在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出版前几年，威尔希尔发表了一篇演讲，并在此基础上于1901年完成了《信托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ust*）。继马克思之后，这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他生活在“我们的工业体系正在演变……从私有制竞争到垄断”的时代，“生产过剩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通过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而我们的消费能力仍然被竞争性的工资制度所阻碍”^⑥。根据威尔希尔的说法，劳动产品要么流向工人，但他们的工资只够生存，要么流向“工业巨头”的口袋，但他们无法消费所有收入。因此，威尔希尔强调，美国资产阶级需要资本集中的理由是，“我们的产品必须在国外有一个出口，因为国内的市场已经不够用了，……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过度制造工业机械。我们的资本已经饱和，不能再吸收了，……美国资本家今天更需要向国外输送他们的资本”^⑦。

几乎完全按照威尔希尔的说法，霍布森也写道：“鉴于用现代机器方法生产的商品可能比能找到的市场更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制造能力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超过了国内市场需求。它的制造业资本已经饱和，无法再吸收更多的资本。正是这种对国外市场的制造和投资的突然需求，导致资本集中的出现。”^⑧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引用了《信托的意义》大量内容，这一事实证实了社会主义对霍布森对帝国主义见解的影响。^⑨

在1936年的《财产还是和平？》（*Property or Peace?*）中，布雷斯福德也强调了资本集中的概念对

① J. A. Hobson,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eretic: The autobiography of J.A. Hobs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76, p.63.

② C. Polychroniou,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raeger, 1991, p.47.

③ J. A. Hobson,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Scott, 1894, pp. 45-46.

④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James Pott & Company, 1902, p.67.

⑤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p.74, p.76.

⑥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p.15.

⑦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p.19, pp.23-24.

⑧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pp.76-78.

⑨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p.84.

于解释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他坦率地承认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借鉴的。布雷斯福德说：“这两位理论家预计‘自由市场和竞争制度趋于消失，垄断取而代之：资本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积累的剩余溢出，确保了对外国市场的争夺。’……历史事实总体上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这一非凡的预测”。^①布雷斯福德在其他论著中大量使用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阐述其帝国主义理论。例如，在1925年的《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Today*）中，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将土地、机器和信贷的所有权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少数人手里”，并且随着“协会固化为信托和联合体，竞争的保障也消失了”^②。1918年的《钢铁与黄金之战：武装的和平研究》（*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 Peace*）一书中，他认为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开始消失，“当资本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发现海外投资能提供更快更大的回报时，现代阶段就开始了”^③。

伍尔夫只是部分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解。虽然他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从竞争转向保护主义的时代^④，但他并没有运用生产过剩的理论，而霍布森、布雷斯福德和威尔希尔在理解帝国主义的根源时却大量使用这一理论。像布雷斯福德和伍尔夫一样，拉斯基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明确承认从古典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新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观点。^⑤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拉斯基接受了布雷斯福德、霍布森、威尔希尔和其他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所使用的生产过剩理论。^⑥和他们一样，拉斯基强调，在发达国家产生和积累的剩余资本推动了资产阶级在国外寻找新的投资，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国外市场的争夺。^⑦

如前所述，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所经历的资本集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垄断的出现。在此点上，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威尔希尔的理论叙述。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他们都认为，在现实中，帝国主义的企业正在兼并和结合，形成被称为“信托”的巨型公司。^⑧这些公司不断完成资本积累，并成为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此外，在新的国际实践中，信托是资本输出的基本催化剂，也是驱使帝国在全世界冒险的重要原因。威尔希尔认为，“这是事实，而非理论”^⑨，一年后霍布森也不谋而合，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理论”^⑩。霍布森和威尔希尔的思想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霍布森在1901年写给威尔希尔的一封信中证实了此点，他在信中写道，“我刚刚读过你的文章《信托的意义》，是迄今为止对资本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最直接、最有力、最令人信服、最科学准确的描述”^⑪。

据上可知，布雷斯福德、伍尔夫和拉斯基与霍布森和威尔希尔有着诸多相似的观点。例如，他们都认为信托是资本积累和集中的原因，在这些大型垄断企业中，保护主义做法很普遍；^⑫信托通常是几个企业的兼并或联合；信托公司是帝国冒险开拓新市场的基本催化剂。这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一部分，这反

① H. N.Brailsford, *Property or peace?* Victor Gollancz Ltd, 1936, pp.256-257.

② H. N.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The New Leader*, 1925, pp.11-13.

③ H. N. Brailsford, *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peace*, G Bell & Sons, Ltd, 1918, pp.64-65.

④ L. Woolf, *The war for peace*,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40, pp.143-144.

⑤ H. J.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L.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Victor Gollancz Ltd, 1933, p.505.

⑥ V.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outline*,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11, p.52.

⑦ H. J.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L.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p.503, p.516, p.524.

⑧ H. J.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L.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p.18.

⑨ H. G. Wilshi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ust, in H. G. Wilshire, *Wilshire editorials*, Wilshire Book Co. Wilshire, 1906, p.31.

⑩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 1938, p.75.

⑪ H. G. Wilshi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ust, in H. G. Wilshire, *Wilshire editorials*, Wilshire Book Co. Wilshire, 1906, p.412.

⑫ H. N.Brailsford, *Property or peace?* Victor Gollancz Ltd, 1936, p.238; H. J.Laski, *Communism*,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6, pp.102-107; L.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A study in economicImperialism*,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p.15, pp.106-107.

过来又意味着对这些市场而争夺。^①正如拉斯基解释的那样，“当马克思写下他的控诉时，资本主义的潜力只是部分显现。今天，我们在帝国主义和战争中看到了它的必然结果。……对恒定资本的日益依赖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获取原材料的斗争”。

三、早期国际关系思想家与阶级冲突和工具主义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外两个关键信条是阶级斗争和工具主义国家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的对立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垄断了国内的一切，政府、政党、警察、军队等国家强力机器都被操控了，沦为了财团占领全球市场以获取垄断利益的工具。本文所考察的国际关系思想家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准则来阐释帝国主义的现象。

（一）阶级冲突论对国际关系思想家们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都存在两个主要的、利益截然不同的阶级。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阶段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

即使是没有公开承认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霍布森也认为“劳资之间存在真正的冲突”。^③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认为阶级（特别是资本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④霍布森认为资本家，尤其是金融家，对帝国主义行为负有主要责任。^⑤

1924年，布雷斯福德发文称：“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⑥显然，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认为，“我们正在进行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阶级斗争。这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与少数行使所有权赋予的权力的人之间的经济权力斗争”。^⑦在《财产还是和平？》一书中，他进一步谴责了资本家，也批评了私有财产，“我们发现经济混乱的根源在于由特权阶级拥有的财产制度——私有制”。^⑧他清楚地相信“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继霍布森之后，他认为资本家从征服中获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因此，他们是推动帝国冒险的人。1935年，布雷斯福德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可能从帝国的海外活动中获得何种经济利益问题进行了更多的阐述，认为一个资本家的典型回答是：“我在国外的企业得到保护……，在地球表面的广袤地区，我的商品享有封闭或优惠的商品市场，垄断原材料，以及资本投资的独家机会。”^⑨

与布雷斯福德一样，伍尔夫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分为两个主要敌对阶级的体系，只有资本家从中受益。他还谴责了源于资本主义的好战行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根源。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难以根除。当然，这也是其他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立场。^⑩伍尔夫表示，将战争和资本主义之间联系起来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贡献。1935年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分析如果采用正确的方式，确实是无可辩驳的，即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保护主义、帝国主义结构几乎不可避免地迟早会产生战争。”^⑪在其他场合，他也明确承认，马克思发展了资本主义产生冲突的思想。^⑫

① H. N. Brailsford, *Property or peace?* Victor Gollancz Ltd, 1936, p.54; L.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p.212.

② K. Marx &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31.

③ J. A. Hobson, *Problems of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industrial condition of the poor*, Methuen & Co., 1899, p.220.

④ J. A. Hobson, *Problems of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industrial condition of the poor*, p.86, p.96, p.356.

⑤ J. A. Hobson,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South Africa*, Tucker Publishing Co., 1900, p.9.

⑥ F. M. Leventhal, H. N. Brailsford and the new lead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9, No.91, 1974, p.101.

⑦ H. N. 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p.36.

⑧ H. N. 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p.240.

⑨ H. N. Brailsford, War and capitalism,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9, 1935, p.169.

⑩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Bookmarks, 2003, p.181; V.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10.

⑪ H. N. Brailsford, War and capitalism,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9, 1935, p.210.

⑫ L. Woolf, *The war for peace*,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40, p.134.

拉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认为两个对立集团之间存在冲突的历史观的采纳是循序渐进的。1916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他写道:“在我看来,劳资之间的斗争,似乎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朝一日将把我们带出资本主义制度,就像我们在16—18世纪摆脱封建制度一样。”^①三年后,拉斯基重申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将由无产阶级带来。“我相信存在真正的阶级战争,……人类能力得到更充分地发展进步源于工人力量的增长。”^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在20年代的拉斯基身上继续得到加强。到了1922年,尽管他仍然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素,譬如价值论,但他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时,是如此描述的,“很显然,这种解释的实质是准确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的通病,……否认它的重要性就是让历史变得难以理解。”^③“也不能否认,不少社会演化已经按照马克思所预测的方向发展,……而且阶级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相反,过去十年的事实直接导致它的恶化。”^④拉斯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接受在整个20年代后期一直坚定不移,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在其1928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与缺陷》(*The Value and Defects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一书中,拉斯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承认,“不可否认,在任何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那些除了劳动之外无东西可卖的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利益划分”^⑤。

拉斯基在1925年左右有意识地信仰费边主义(Fabianism),在1930—1931年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然而,在此时期之前,他就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20世纪30年代,拉斯基开始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洞察应用到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中,特别是对由法西斯主义崛起引发的帝国主义的理解上。但与布哈林、列宁等其他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家相比,拉斯基并没有什么原创性,几乎忠实地模仿了他们。1932年,他认为帝国主义是发达国家为剥削不发达经济体而进行的“市场斗争”;与列宁一样,他将一战视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典型例子。^⑥此外,与他的前辈——威尔希尔、霍布森、布雷斯福德、列宁等人一样,拉斯基强调资本家要为帝国主义冒险负责,因为他们正在寻求征服新的市场。^⑦而且,他与列宁、布雷斯福德相似,强调资本被推向出口,因为它在国外获得的利润比在当地市场获得的利润大,尤其是在不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对权利和工资的要求更少。

(二) 国家工具论对国际关系思想家们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工具主义国家观是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关键准则,它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的著名论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一个特权集团,“需要在全世界各地为其产品不断扩大市场”^⑧。本文论及的四位国际关系早期思想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视角。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越少,对资本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越有利。^⑨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一致,霍布森认为资产阶级经常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谋利。在他看来,资本家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特别是为了开辟新的市场,“不得不寻求国家的帮助”^⑩。因此,霍布森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私人利益集团(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为他们在本国之外获得经济利益”^⑪。

① M. DeWolfe (Ed.),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s. 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76.

② M. DeWolfe (Ed.),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s. 1-2), p.206.

③ H. J. Laski, *Karl Marx: An essay*, The Fabian Society, 1922, p.35.

④ H. J. Laski, *Karl Marx: An essay*, p.38.

⑤ K. Marx &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31.

⑥ H. J. Laski, The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communism, *Foreign Affairs*, Vol.11, No.1, 1932, pp.96-97.

⑦ H. J. Laski, *Karl Marx: An essay*, The Fabian Society, 1922, p.503, p.516, p.524.

⑧ K. Marx &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34, p.36.

⑨ P. Costello,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crises, *Theoretical Review*, No.20, 1981,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periodicals/theoretical-review/19812001.htm>.

⑩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 1938, p.xiii.

⑪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p.94.

布雷斯福德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工具论观点。在国际层面上，他追随霍布森，认为国家是为了帝国目的而被资本家操纵的。然而，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国内维度。布雷斯福德坚持认为，“一个建立在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基础上的社会必须要有它的强制手段——可以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国家”^①。这类似于被布雷斯福德视为“杰出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家”卡尔·考茨基的早期观点，“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总是在剥削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了，但在国内，资本知道国家力量在背后保护它，这一点让人放心”^②。总而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布雷斯福德认为“国家是一种为国内外少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力量机构”^③。

伍尔夫与霍布森、布雷斯福德一样，认为资本家经常为了帝国的目的而寻求国家的帮助。例如，在其1920年的《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中，他称19世纪末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大英帝国在中国的行动是“外国金融家集团的利益得到其政府支持”的典型案列。^④在其《帝国主义与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伍尔夫声称，作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代国家……被资本家援引来帮助他们开发或剥削其他大陆地区”^⑤。

与其他理论家一样，拉斯基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工具论观点。然而，他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采纳是渐进的。早在1917年，他就认识到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机构”。^⑥当时拉斯基思想的特点是否认国家高于其他机构。他认为主权是一个捏造的概念，是将国家作为强制手段的借口。^⑦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拉斯基在其1927年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书中写下了对国家工具主义颇有同情心的观点。虽然他排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及其对革命的呼吁，但他既没有批评布哈林将国家视为“仅仅是资产阶级保障剥削的联合体”，也没有批评恩格斯把这个机构定义为“阶级压迫的工具”。^⑧他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批评了“古典唯心主义国家理论”，因为该理论将该国家机构视为一个公正的实体。尽管拉斯基在这次演讲中还没有清楚地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显然接受了将国家工具主义观作为他分析的工具。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拉斯基明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工具主义观点。他在1932年肯定地说：“在任何社会，国家都属于经济权力的拥有者。”^⑨一年后，他简称：“在经济过程中存在不平等利益的任何国家，国家权力将由拥有经济权力工具的人支配。”^⑩1935年，他把国家设想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拥有生产工具的那个阶级的工具”^⑪。同年，拉斯基强化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国家作用的理论工具具有优越性：“在马克思之前，可以说大多数政治投机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理解财产关系在决定国家目的方面的支配性影响。”^⑫拉斯基对工具主义的采纳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不断得到体现。在1943年为费边社（*Fabian Society*）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他认为英国工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愿意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⑬。他认为英国工党“必须认识到……未能理解政党的政策是

① H. N. Brailsford, *War and capitalism,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9, 1935, p.169.

② K. Kautsky, *Socialism and colonial policy*, 1907, p.107, http://www.workersliberty.org/files/kautsky_colonial.pdf.

③ H. N. Brailsford, *Why capitalism means war, The New People's Library*, XIV, 1938, p.39.

④ L. Wool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Swarthmore Press Ltd., 1920, p.90.

⑤ L.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Hogarth Press, 1928, p.10.

⑥ M. De Wolfe (Ed.),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s. 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76.

⑦ H. J.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 pp.x-xi.

⑧ H. J. Laski, *Communism*, Williams & Norgate Ltd., 1927, p.127, p.145.

⑨ H. J. Laski,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VI, No.4, 1932, p.640.

⑩ H. J.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L.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Victor Gollancz Ltd., 1933, p.533.

⑪ H. J.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 p.xii.

⑫ H. J.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5, p.103.

⑬ H. J. Laski, *Marx and today*, The Fabian Society and Victor Gollancz Ltd., 1943, p.3.

由更深层的经济力量形成的，这些力量对政党的影响远大于政党对经济力量的影响，……生产关系渗透到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所有其他因素中，并适应它们。……然而，工党存在对阶级斗争的深度及其所有影响视而不见的情形”^①。

四、早期国际关系思想家与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和革命理论观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所考察的国际关系思想家都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都强调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要为帝国主义的行为负责，也都批评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性质。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将社会主义和革命视为解决帝国主义问题的可行方案。

（一）资本主义剥削观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四位国际关系思想家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他们的观点至少在三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

首先，他们经常谴责经济发达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活动。霍布森使用当今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解释：“在白人对这些低等种族的管理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当前的秩序，私人管理对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工业剥削，以获取私人的直接利益。”^② 布雷斯福德认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对弱国和日薄西山帝国的潜在财富的剥削正在迅速成为一项官方事业，……其中利润完全进入私人口袋。”^③ 伍尔夫和拉斯基也强调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④ 这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一致，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代名词。

其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他们认为资本家是剥削工人阶级的。他们一致认为 20 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他们相信“由机器而产生的财富创造能力的净收益并未被社会中的所有阶层平等分享，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大的收益”^⑤。他们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集中了生产资料，并将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⑥ 伍尔夫表示，在他所处时代，大约“英国国民收入的 2/3 分配给了 1/3 的人口”。他还断言，“在现有制度下，工具和机器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并受私人控制”^⑦。同样，拉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内在矛盾，工人日益贫困，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⑧ 等。

同样，布雷斯福德也认为资本主义“将土地、机器和信贷的所有权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⑨，“资本主义制度……总是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不公正分配……拿走了本应支付工资的利润”^⑩。这表明，布雷斯福德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剩余劳动”的概念。伍尔夫和拉斯基也接受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准则，伍尔夫对这一概念解释道，“体力劳动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系统的中心，这个系统假定只有当你从生产中获得利润时，你才会生产；然后他发现，当他努力增加了生产，大部分利润却流入别人的口袋……大量的

① H. J.Laski, *Marx and today*, The Fabian Society and Victor Gollancz Ltd., 1943, pp.16-17.

②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1938, p.295.

③ H. N. Brailsford, *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 peace*, G Bell & Sons, Ltd.,1918, p.61.

④ H. J. Laski, *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George Allen & Unwin, 1948, pp. 247-248; L.Wool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Swarthmore Press Ltd., 1920, pp.66-69; L.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George Allen & Unwin,1920, p.317, p.352.

⑤ J. A. Hobson, *Problems of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industrial condition of the poor*, Methuen & Co.,1899, p.44;H. N.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The New Leader, 1925, p.50;H. J.Laski,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abian Society and Unwin Limited, 1930, p.8;L. Woolf, *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y*,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19, p.9, p.213.

⑥ K. Marx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37.

⑦ L. Woolf, *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y*,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19, p.9; L. Woolf, *Socialism and cooperation*, Leonard Parsons, 1921, p.24.

⑧ H. J.Laski, *Communism*,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6, p.29.

⑨ H. N.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The New Leader, 1925, p.11.

⑩ H. N.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p.50.

体力劳动者被迫生产，如果他们不生产，他们就会饿死。”^①

霍布森和拉斯基认为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家对帝国主义的罪恶负有全部责任，但布雷斯福德和伍尔夫也认为，资产阶级并不完全犯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罪行，罪行源于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问题。^② 拉斯基和伍尔夫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一般的法西斯分子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伍尔夫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资本家对他们的行为并不完全有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允许把个人牟利本身视为个人或政治行动的合法动机，……并且仍然把自己视为慈善家、爱国者和最可敬的绅士。夸大这些人的个人责任或罪孽是错误的”^③。伍尔夫的观点类似于马克思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最著名格言：“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④

再次，尽管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但也承认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进步因素。譬如霍布森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特征时，同时认为这种制度也带来了一些好处，诸如包括创建新企业和更高的经济效率。^⑤ 布雷斯福德也是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者，但也承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常也伴随着一些进步。他认为，“如果我们否认帝国主义的文明使命，我们这些自称本能或理智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将犯下严重错误，……它带来的教育、智力提高和人道政府的礼物，总是自律行为的副产品。”^⑥ 同样，伍尔夫也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具有剥削性，但它也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有限的益处，铁路建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⑦ 拉斯基也认识到，“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代表了对先前经济体系的明显和必要的进步”^⑧。尽管如此，他澄清说，从长远来看，“当收缩阶段到来时，资本主义民主如果要继续下去，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这意味着国际紧张和冲突，因此，其生产关系的逻辑要求保留主权”^⑨。

四位思想家客观评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区存在发展与进步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革命奠定物质基础。”^⑩

（二）社会主义和革命理论观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解帝国主义的影响

强调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尽管上述四位国际关系思想家在此方面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意见，但他们在此方面无疑均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们都认同需要取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他们四人中，霍布森在此信念上离马克思主义最远，他也是唯一认为可以改革资本主义并使其更加平等的人。^⑪ 尽管如此，霍布森仍承认社

① L. Woolf, *Socialism and cooperation*, Leonard Parsons, 1921, p.48.

② H. N. Brailsford, *After the peace*, Leonard Parsons, 1922, p.120; L. Woolf, *The international post-war settlement*, Fabian Publications Ltd., 1944, p.4.

③ L.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p.321.

④ K. Marx, Preface to the German edition, In K. Marx, *Capital* (Vol.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p1.htm>.

⑤ J. A. Hobson,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Rev. ed.), 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Ltd., 1906, pp.254-255.

⑥ H. N. Brailsford, *Olives of endless age*,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8, pp.279-280.

⑦ L.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Hogarth Press, 1928, p.124.

⑧ H. J. Laski, *Communism*,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6, p.105.

⑨ H. J. Laski,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The Viking Press, 1947, pp.242-243.

⑩ K. 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P. J. Cain & M. Harrison (Eds.), *Imper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 Routledge, 2001, pp.204-207.

⑪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 1938, p.85, p.96.

会主义将通过提高工资以及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解决剩余资本的问题，从而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①而霍布森承认剩余资本“需要‘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天敌，因为它们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手中夺走了形成帝国主义经济刺激的剩余收入”^②。除此之外，霍布森还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

其他三位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支持社会主义作为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直接解决方案。布雷斯福德认为，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现和平的唯一真正解决方案。^③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摆脱战争的可靠途径”^④。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认为，对帝国主义的唯一最终补救办法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将开始得到加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⑤。而且，布雷斯福特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贫富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最终结束，除非“篡夺的阶级已经被其资本转移到社会而被处置。斗争不可避免，但胜利将意味着……阶级本身的消灭”^⑥。

与布雷斯福德一样，伍尔夫在国联成立后也迅速成了“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立场的坚定支持者。例如，在1920年，他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家相信关于社会的某些东西是虚假的，并渴望社会中的某些东西是坏的；反之，社会主义者相信关于社会的某些东西是真实的，并渴望社会中的某些东西是好的”^⑦。到了30年代，伍尔夫又明确宣称：“社会主义是解决世界经济困境的唯一永久解决方案。”^⑧在伍尔夫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至少有四个核心特征：一是“应该结束私人盈利利益的无序竞争”^⑨。二是作为第一点的解决方案，“社区的经济资源不应由个人或阶级拥有和控制，而应由整个社区拥有和控制”。三是伍尔夫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将保证“废除私有制”。四是提出“废除阶级结构”以保障文明的发展。^⑩无疑，在伍尔夫反对特权阶级、支持社区利益、消灭财产和阶级等立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烙印。

自1925年以来，拉斯基认可了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剥削性和战争倾向性的方案。^⑪他将社会主义设想为“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积极干预，以确保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他们的利益”。^⑫并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以一种更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定义了这样一个社会，“所有重要的生产工具都为共同所有，并为整个社会民主运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就已经停止了。”^⑬到了30年代，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拉斯基开始更强烈地宣扬社会主义是解决帝国主义的唯一持久方案。在其1933年《和平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中，他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竞争对手，它代表了通往和平之路。^⑭在其1935年的《国家的理论与实践》（*The State in Theory and*

① J. A. Hobs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Hogarth Press, 1932, p.35.

②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3rd ed.)*, George Allan and Unwin Ltd., 1938, p.90.

③ H. N. 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The New Leader*, 1925, p.118; H. N. Brailsford, *Why capitalism means war*, *The New People's Library*, No. XIV, 1938, p.86.

④ H. N. Brailsford, *Property or peace?* Victor Gollancz Ltd., 1936, p.261.

⑤ K. Marx &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59.

⑥ H. N. Brailsford, *Socialism for today*, p.36.

⑦ L. Woolf, *Socialism and cooperation*, Leonard Parsons, 1921, p.5.

⑧ L. Woolf, *Socialism in our time*,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9, 1933, p.302.

⑨ L. Woolf, *The international post-war settlement*, Fabian Publications Ltd., 1944, p.3.

⑩ L. Woolf, *Socialism and cooperation*, Leonard Parsons, 1921, p.21, p.123, p.97.

⑪ H. J. Laski, *Socialism and freedom*, *Fabian Society*, 1925, p.3, p.7, p.10, p.13.

⑫ H. J. Laski,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abian Society and Unwin Limited*, 1930, p.6.

⑬ H. J. Laski, *Socialism as internationalism*, *Fabian Publications Ltd. And Victor Gollancz Ltd.*, 1949, p.3.

⑭ H. J.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L.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Victor Gollancz Ltd.*, 1933, pp.525-526.

Practice)中,拉斯基更是坚称,“通往有效国际秩序的大道在于重建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一点做得越有效,国家对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方面的兴趣就越小”^①。拉斯基将社会主义作为克服帝国主义的真正手段,这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里始终如一坚持的。^②

拉斯基广泛地依靠马克思主义来阐述他的国际思想,在30年代,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解世界事务的主要理论工具。正如他自己所言,“社会哲学家所掌握的任何工具,无论是在解释思想运动的能力方面,还是在预测其实际结果的权威方面,都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性质和功能,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的习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与它的任何对手相比都具有优势。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崩溃,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非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作用,它都具有其他分析方法所不具备的洞察力”^③。

综上所述,通过对四位杰出国际关系思想家对帝国主义这一早期国际关系重要研究主题的大量见解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力量,对20世纪前40年的早期国际关系的形成发展,对国际关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理论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学科的早期形成阶段经常被著名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用来理解帝国主义的主题,是他们都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集中、工具主义、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等信条作为其政治思想或国际理论的关键要素,因此,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诚然,这些国际关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有差异,这也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议题。

On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the Early Formative Sta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IR Thinkers' Understanding of Imperialism

LI T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BR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an era of form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n extraordinary wealth of Marxist political thought. A study of the extensive insights of four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ers on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of imperialism reveals that th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ers explicitly adopted the Marxist tene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Class Conflicts and Instrumentalism,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Socialism as key elements of thei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Marxism, as a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force, played an unrecognized but fundamental role a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ers.

Keywords: Marx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ers, Imperialism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H. J.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5, p.254.

② H. J. Laski, *The crisis of our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26, No.1, 1947, p.42.

③ H. J. Laski, *A key to communism*, *New Statesman*, No.20, 1935, p.102.